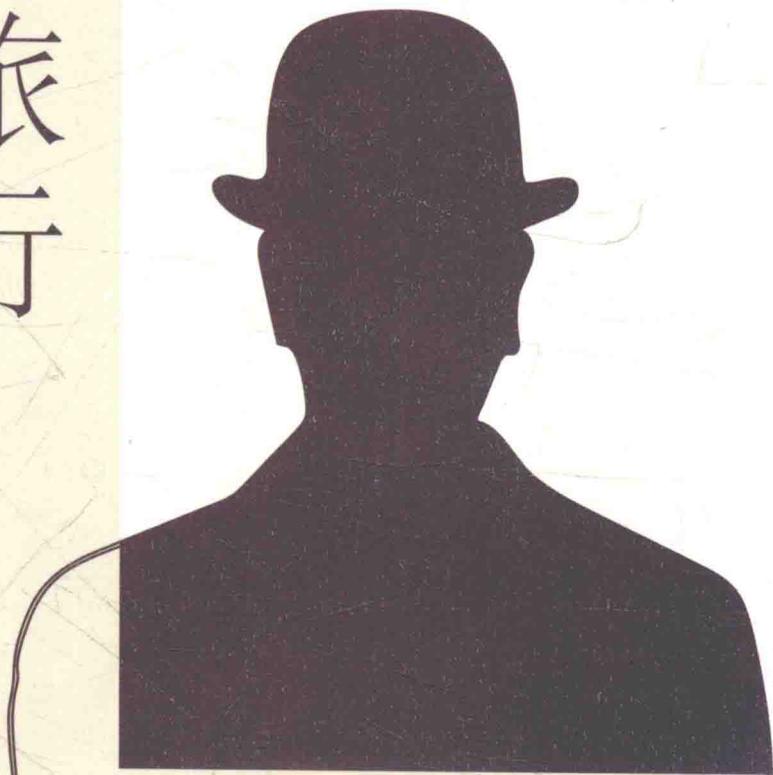


文化 间的

理论旅行

比较文学与
跨文化研究论集

周宪 著



译林出版社

文化间的 理论旅行

比较文学与
跨文化研究论集
——周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 / 周宪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447-6928-0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比较文学 - 文集 ②文化交流 - 文集 IV. ①I10-03 ②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0657 号

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 周宪 / 著

责任编辑 于伊莎
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特约校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单莉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928-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序 言

收录于此的十几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二十年中在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看法。虽然比较文学在中国一直很热门，吸引了很多人的热情参与，我自己也担任江苏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多年，参与过不少国际或国内的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还在香港一所大学讲授过比较文学课程，但说实话，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这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工作与比较文学无关，而是我一直敬畏“比较文学”这个称谓，这个领域范围过于宽阔，涉及现象过于庞杂，观念方法过于多样，要胜任这一研究超越了我的能力和学识。钱锺书先生三十多年前在给一位青年学者的信中坦陈，比较文学说穿了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且广义地看，晚清甚至唐代就已经存在了。我心仪此一说法，因为比较

的方法是文学或文化研究中最常见也最上手的分析方法。这么看，这些文章充其量也就是用比较方法考察了中西文学艺术和文化的某些问题，谈不上系统的学科性建构，也说不上太多比较文学的学理性。

所以会写这些文字，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为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撰写的发言，也有平时研究出于一时兴趣之作，还有一些算得上是标准的“命题作文”。从最早一篇写于1990年代末的布莱希特研究，到2016年关于用中国智慧解决艺术边界问题的文字，整整跨越了二十年时间。今天，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已经相当泛化了，各式各样的人文学术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触及比较文学。更有趣的情况是，据我观察，晚近比较文学又和世界文学较上劲了，处在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中，这是其一；其二，比较文学也随着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流行，随着文化和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起，越来越转向了跨文化或跨文明研究。我的这些文章从某个角度来看，倒是契合这些发展趋势的。进一步，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所谓“跨文化”就是“有关不同文化或它们之间的比较”（Relating to different cultures or comparison between them）。据此，将此书看作是一本跨

文化研究文集也许是合适的。

我始终认为，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西方或其他文明的成长来说，离开了相互之间的交流是无法想象的。尽管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热衷于阐扬文明冲突论，但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互动越来越频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研究无可避免，而且愈加重要。如果说几百上千年以前尚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在 21 世纪的当下，不同文化和而不同的相处、融汇和互动不可阻挡。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跨文化研究才成为我学术研究中一个可持续的领域。

本书虽说是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但内容繁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相关的主题。第一部分是有关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观念与方法，着重考察跨文化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核心概念，尤其是晚近非常热门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也可以视作跨文化研究的本土性或在地性问题，包括用中国智慧来解决一些理论难题，本土人文学科所面临的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等。第三部分是

对三位法国当代思想家的批判性分析，既考察了他们的思想对本土学术的影响和启迪，也对其问题做了中国视角的审视和阐发。第四部分的主题涉及自我—他者的镜像互映关系，前两篇分别讨论挪威和德国剧作家和艺术家的中国镜像的建构，最后一篇概要地分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心路历程和观念转变。这些文章收录于此时做了稍许修改，并对文章标题做了一些调整，特此说明。

是为序。

2017年初于香港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编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

一、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解与解释 ...3

二、跨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25

三、文学研究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46

四、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76

第二编 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101

五、从中国智慧看“艺术边界” ...103

六、“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 ...129

七、在知识和政治之间 ...158

八、人文学术的原创焦虑 ...172

第三编 法国理论的中国旅行	...189
九、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191
十、巴特的中国“脸谱”	...220
十一、以德布雷视角反观中国知识分子	...244
第四编 互映的自我—他者镜像	...275
十二、易卜生和蒙克的中国镜像	...277
十三、布莱希特的中国镜像	...299
十四、以他观我的“游记意识”	...320

第一编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解与解释

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

在知识生产的不同领域中，跨文化研究有截然不同的特点，需要特别地和仔细地辨析和讨论。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就有许多独特性，比如比较文学或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首先，人文学科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理解上的文化差异。比较一下自然科学，这个特征就一目了然。自然科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往往不会有严重分歧和差异。一篇英文的关于癌症的医学文献，对于非英语读者来说通常不会有理解上的歧义。但是，在人文学科领域，

关于《哈姆莱特》或《红楼梦》，却有大量的不同文化解读和解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文学科领域的跨文化研究中，充满了理解、解释上的差异、歧义和冲突。用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语言来描述，科学和艺术（人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范式，科学追求唯一的、最新的答案，而艺术则容忍各种不同的解释；¹或用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解释学语言来说，科学属于“硬理论”，而文学（人文）则属于“软理论”，“硬理论”的特征是可以推导出种种预测的法则，而“软理论”则无法推导出预测的法则。²显然，独特的知识范式决定了跨文化交流和研究在人文学科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解释学上所说的“解释冲突”难以避免。

其次，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也导致了跨文化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典型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情境，乃是本土学者对来自其他文化的他者之文本做出分析或解释。文本研究迥异于主体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它缺乏面对面的即时互动和纠偏功能。通常的情形是人文学者个体对某个他者文本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处于特定的语境和

1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0页以下。

2 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解释共同体之中。这个情景颇有些像旅行与戏剧。研究者通过文本的解读想象性地进入异国他乡，如同一个观光客闯入陌生国度的旅行，观光客自身的文化必与异邦风土人情的碰撞必产生差异、歧义甚至冲突。这样的他者文本的解读，也有点像一个中国导演来排练导演一个外国剧本（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如何诠释来自他者文化的剧本，如何解释其人物、冲突、剧情或主题，都涉及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复杂关系。

再次，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有比其他领域更为不确定的交互性。从研究者（主体）到文本（对象），再到语言（媒介）、解读方法和文化语境等，存在着形态各异的交互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可作如下描述，即人文学者通过语言媒介来理解并解释他者文本之意义。在这个描述中，至少存在着几重交互关系：不同文化的主体间关系（intersubjectivity，交互主体性），不同的多重文本间关系（intertextuality，互文性），至少两种不同语言间的关系（interlingual，母语与外来语），自我与他者的交互语境关系（intercontext），最后还有一个总体性的文化间关系（interculture，不同文化的交互性）。跨文化研究的理解和解释就发生在这些频繁互动

的交互关系之中，依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界定为：本土文化研究者在语境间对话关系中的他者文本所展开的研究主体间的跨文化对话。

以上三个方面决定了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它又进一步转化为人文学科跨文化研究的难题：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甚至意识形态冲突和协商。如何克服冲突而达到协商性的跨文化理解和解释？如何将偏见、误解、歧见从某种跨文化障碍转变为积极的资源？这些居间的交互性如何有助于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理解和解释？

交互关系中的编码与解码

如果把跨文化研究视为某种信息的交流的话，那么，信息论和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模式。从信息论角度看，跨文化研究乃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信息生产、传递和接受的完整过程，包含了发送者—信息载体—接受者三个要素。对发送者来说，他的工作就是信息的编码。对接受者来说，他的任务就是解码这些信息。由于编码和解码的语言和文化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对称性及差异，所以，他者文本信息在

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受者那里发生歧义和变形，是自然而然的。

霍尔（Stuart Hall）在其关于电视文本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符号学的编码—解码模式。他认为编码—解码之间存在着多重差异性，这是由符号差异、发送者和接受者所处位置的不对称等所造成的。从编码到解码构成了信息发送到接受的结构差异，因而会造成信息的歪曲和误解。在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主导的文化秩序（dominant cultural order）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私人的、个体的和不同形式的解码过程，即有各式各样的“选择性感知”（selective perception）。从总体上说，存在着霍尔所说的三种不同解码方式。第一种是“主导—霸权位置”（dominant or hegemonic position）的解码，其特征是信息解码是在主导符号范围内进行的，是一种信息明晰传播的理想情况。简言之，这种形式的解码与编码趋于一致，即是说，解码者大致是按照编码者的意图来理解信息。第二种是“协商性符号或位置”（the 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解码，其特征是解码者既部分地认同了主导性的编码意义，又部分地抵制或偏离了编码意义，因而处于一种妥协的状态。第三种解码的特征

是“对抗性符号”(oppositional code),它以某种全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来解码,完全颠覆了编码规则,做出了某种完全不同于编码的解码。¹我们可以简略地把三种解码依次界定为:顺从性解码、妥协性解码和对抗性解码。这三种解码方式也可以用于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它告诉我们,对同一编码的他者文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可能性。当然,实际发生的跨文化理解和解释远不止这三种。

就人文学科的跨文化研究来说,本土人文学者对他者文本的解读情况要更为复杂。道理很简单,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和悬殊的差异。所以,霍尔所说的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不对称现象更为常见。因此,不同解释者对他者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就中国对西方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而言,一些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在中国反应平平,而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作品却在中国语境中引起很大反响。举戏剧为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五四”

1 Stuart Hall,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eds.,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7), pp.32—33.